

金融危机十周年：世界改变了多少？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海波



张海波

2008年9月15日，美国四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崩盘，揭开了撼摇世界经济乃至政治秩序的全球金融危机。十年来世界改变了多少？当今世界是否汲取了金融危机的教训？本期“论坛”特请专家做一解读。

2 强化保护主义民粹主义趋势

问：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有哪些影响？
答：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强化了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趋势，其中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是最为典型的两个政治事件。全球化具有非中性特征，发展利益在不同国家、地区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存在长期失衡现象。因此，伴随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反全球化的浪潮从未消逝。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99%民众对1%精英的斗争体现了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也是造成美国社

会包容性下降的主要原因。从一定意义上看，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也是因为美国社会包容性问题无法解决，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从而转嫁国内矛盾和压力。
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欧债危机，加上难民危机的影响，直接导致了英国脱欧，并对欧洲一体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西欧国家民粹主义风起云涌，从德国的选择党、法国的国民阵线党，到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荷兰的自由党等，无不打着排外、疑欧甚至反欧盟的政治口号，在选举中的得票率不断上升。这些民

粹主义特征明显的政党之所以得到民意支持，正是由于金融危机凸显了国家治理能力赤字问题。
欧债危机已经让欧盟焦头烂额，雪上加霜的难民危机更加剧了欧盟内部的责任分担矛盾。欧盟面临前所未有的人权和安全的两难困境，接收难民符合欧盟捍卫人权的价值理念，难民涌入所引发的社会安全问题却考验着欧盟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伴随难民而来的恐怖主义事件增多，不安全感推升了欧洲国家对进一步开放边界的疑虑。因此，就难民危机而言，欧盟在捍卫价值理念和实际应对能力方面存在明显差距，民众失去对政府信任的持久负面影响很难在短期内消除。

1 问：十年来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有哪些影响？

答：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多重且复杂的，其中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最为直观。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速率为0，2009年下滑为-2.8%。中国2008年11月起净出口持续加速下滑，2009年1月出口减速为13.9%，到10月下滑达25%，中国经济增速也由两位数跌到个位数。好在，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联手刺激下，世界经济增长很快就得以恢复。至2010年年底，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到或接近危机前水平。

但是，各国增长并不平衡，这种趋势日益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8年和2019年全球增长率将达3.9%，一些主要经济体增长率已经达到峰值，其中美国经济势头仍在加强，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的增长预测已经下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由于石油价格上涨、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一些基本面较弱的经济体的货币面临市场压力。

总的来看，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有着更为深刻和系统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对金融创新的反思和加强金融业监管的国际共识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近日发表《雷曼兄弟事件十年——经验教训与未来挑战》一文写道：“如今回顾，压力点似乎显而易见。但在当时，它们不太明显。所谓压力点是什么？最为核心的是金融创新，它的发展远远超越监管。”

其次，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有所推进。在二十国集团这一协调全球经济事务首要平台的努力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改革有所推进，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得到提升。但是全球经济改革的阻力和困难依然很多，比如美国独大和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在破坏全球经济治理，也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第三，加剧了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力，对国家治理和宏观经济协调带来新的挑战。

3 特朗普打贸易战治标不治本

问：当今世界汲取了金融危机的教训吗？如何看待金融危机始作俑者和重灾户的美国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答：金融危机的救助是有代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有24个国家深受银行业危机之害，其中多数国家的经济活动至今仍未回归正轨。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增长幅度超过了GDP的30%，美国2009年财政赤字高达1.42万亿，创下二战后最高水平。政府赤字上升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经济不景气，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刺激经济的努力，以及救助濒临破产银行的行动。

美国金融危机救助集中在金融系统，采取了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主的救助措施，2008年11月开始的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总计释放近4万亿美元资金。日本和欧盟的宽松货币政策甚至突破了零利率下限，出现负利率。宽松政策所制造的流动性泛滥推升了新兴市场国家热钱流入，在美国经济转暖后美联储退出宽松货币和持续加息的作用下，热

钱又从新兴市场回流美国，对当前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和经济下滑难辞其咎。

金融危机的有益教训在于对金融风险的监管意识和国际共识增强，但是与此同时，危机救助的方式和路径又引发新的风险，同样值得警惕。比如，银行“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在危机救助中，最先获得重视和资金救助的金融机构是以其是否引发系统风险来衡量的。相反，一些中小型金融机构则被忽略不计，破产在所难免。因此，富有戏剧性的一面发生了，制造危机的金融机构得到政府救助，承受危机影响的中小企业和普通大众却不得不为危机救助买单。

或许正是在这种不公的现实面前，美国选民出于愤怒而投了特朗普的票。特朗普也正是打着为美国人民谋福利的“美国优先”口号，开始实施激进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因此，十年后的今天反思金融危机的教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政府责任的认识应该有所深化，对社会包容性的关注应该成

为政府治理经济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对于当前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单边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其深层次的根源在于美国国内治理出了问题。奥巴马的医保法案改革致力于覆盖全体国民的医疗保险，以实现社会公平和包容，但也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美国财富分配制度的不公。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要解决社会包容性问题的难度更大。作为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表，特朗普的减税计划使富人更多获利；打着为了制造业回流的旗帜而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最终导致的消费终端价格上升还将由美国普通大众承受；以保护美国社会为目的的强硬移民手段，不仅没有缓解国内种族冲突，反而雪上加霜。

因此，在国内社会发展包容性步履维艰的特朗普政府不得不找一个外部的替罪羊，而中国就是最佳目标。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者，不仅可以团结国内一致对外，而且有助于释放内部矛盾的压力。但是，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对美国而言并非最优选择。在全球化潮流之下，各国相互依赖加深是客观事实，以损害别国利益来谋取自身发展，不仅短视，而且也是不可持续的发展。

4 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作贡献

问：在全球灾难性的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逆流而上，为世界带来什么影响？

答：中国对世界经济走出金融危机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却不得不独自承受为救助世界经济走出危机而采取的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计划的负面影响。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不同于美国，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出口部门而非金融体系，因此刺激内需和扩大投资成为中国刺激经济的着力点。实际上，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已经处于过热，产能过剩已经显现苗头。金融危机爆发后，出于维护经济增长的政治考虑和在二十国集团平台与欧美国家达成联手刺激计划的承诺，中国推出4万亿元刺激计划。这一举措推升了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并且进

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矛盾。但是，也正是在这一大规模刺激政策下，中国经济维持了较高的增速，护住了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大盘。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对世界经济从危机中复苏作出了极为关键的贡献。

2013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至少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发展贡献、制度贡献和治理贡献。

从发展贡献看，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从未忘记帮助发展中国家。根据2014年发布的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仅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就达893.4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323.2亿元人民币。刚刚落幕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助力非洲发展而提出“八大行动”，包括产业促进行动、设施联

通行动、贸易便利行动、绿色发展行动、能力建设行动、健康卫生行动、人文交流行动、和平安全行动。为推动“八大行动”顺利实施，中国愿以政府援助、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融资等多种方式，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支持。

从制度贡献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强大生机，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希望既加快发展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从治理贡献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并参与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南南合作基金，以及即将召开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都是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切实贡献。值得一提的是，进博会是中国主动开放国内市场的单方面举措，与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形成鲜明对照，是中国践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真实写照。

全球气候治理四个关键词注入新动力

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主办的全球气候行动峰会日前在旧金山落下帷幕。来自全球各地的4000多名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就减少碳排放、捍卫《巴黎协定》成果达成多项共识，宣布要“把全球气候治理雄心带上新台阶”。会上反复提及的几个关键词，让人感受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动力。

“自下而上”

美国联邦政府不是会议召集方，甚至没有派代表参会。美国联邦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漠视遭到峰会与会者，尤其是美国地方政府、学术界和企业代表强烈批评。
加州州长布朗和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

特使、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等知名人士表示，在美国联邦政府袖手旁观的情况下，很多州、市、企业和社会团体正在地方层面“自下而上”积极推进气候治理。美国前国务卿克里称，这表明“美国民众并没有退出气候协定”。

“自下而上”的另一个体现是，参会代表多是各国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次国家”主体，他们在展现低碳发展意愿的同时，也共同呼吁各国在国家层面拿出政治意愿，合力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

“时不我待”

与会代表在峰会上警示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希望唤起国际社会“时不我待”的紧迫

意识，敦促各国政府在气候治理上加快行动。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环境科学教授约翰·罗克斯特伦等专家认为，近年来地球上发生的极端气候事件显著增加，全球气候正以超过预期的速度发生变化，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他们强调，各方需要在《巴黎协定》的基础上加快行动，超额达成减排目标。

相对于“低碳”概念，“零碳”概念更值得推崇。一些与会城市提出各自时间表，谋求实现碳排放完全被自然界吸收的碳中和目标。

“我们承诺”

“我们承诺”的声音在峰会主场和分会场接连回响，与会各方作出了500多项承诺。

全球100多名地方政府领导人及企业高管承诺，各自所管辖的地区或机构最迟于2050年实现碳中和；60多名地方政府领导人及企业高管承诺，各自所管辖的地区或机构于2030年前实现交通零排放；488家企业承诺自主设定减排目标；近400家投资机构承诺向低碳转型进程提供资金支持。

“中国典范”

中国代表团在峰会期间举行“中国角”系列活动，分享中国经验，发起“气候变化全球行动”倡议，举行“中国企业气候行动”启动仪式。中国地方政府、企业、公益组织、研究机构等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行动倡议及绿色基金引发多方兴趣。

与会人士认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事务上作出了庄严承诺，一直重诺笃行，为全球树立了典范。
李飞虎 吴晓凌